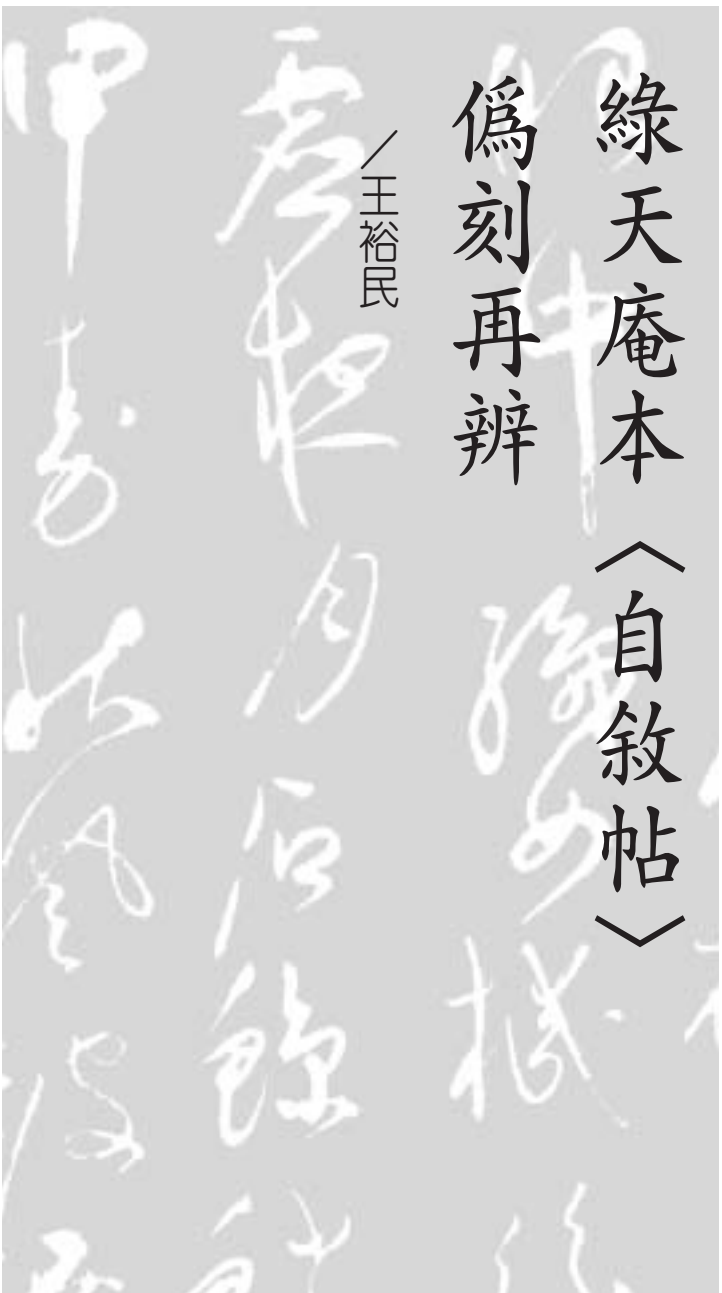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綠天庵本〈自敘帖〉 偽刻再辨

／王裕民



## 前言

筆者於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三五期，發表〈綠天庵本「自敘帖」偽刻考辨〉，經由綠天庵刻本的懷素「大草千字文」，來旁證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的不可靠，本文則將範圍擴大，再論

及綠天庵刻本的五種專帖，以確定綠天庵所刻之帖完全出於偽刻，並考證出此一刻本乃是刻於清朝乾隆年間。

## 一、《湖南通志》與《永州府志》之記載

### (一) 聖母帖

《湖南通志》：

案綠天庵有聖母帖，石刻首題「綠天庵瑞石帖」六篆字，審其字蹟，蓋亦近人取西安元祐石刻本重模者。不獨行款、字數更易，并誤以「脫異俗流」下「鄙遠塵愛杜氏初怒責我婦禮聖母儵然」十六字，刻於後「則有鳥禽」下，錯謬殊甚。推求其故，此十六字西安本作二行，蓋從表本鉤摹，因此一行表本誤裝於後，未經更正耳。後去元祐題記一行，而太和題名仍模刻，且不知古人文字有從後讀起如此題名者，所謂左行也。而以「同登」二字移在首行「裴休」名下，更為不學可笑。故今據西安元本著錄而辨正之。

《永州府志》：

「綠天瑞石」蓋即相傳石成蕉紋之說，當時或即採本山之石所成，故以名帖，藉示誇詡耳。

### (二) 千字文

《湖南通志》：

湖南永州零陵綠天庵的刻帖共有五種，分別是「自敘帖」、「聖母帖」、「大草千字文」、「杜詩秋興八首」與「論書帖」，以下分別列出清朝地方志對此五帖的記載，一為清嘉慶二十五年（一八二〇）刊本的《湖南通志》，（註一）一為道光八年（一八二八）刊本的《永州府志》。（註二）

### (一) 自敘帖

《湖南通志》卷二〇五，〈金石略〉：

案自敘帖在零陵縣東門外綠天庵，似是近代人重模本，不及文氏釋文版本之精。且綠天庵石刻首題「綠天庵懷素自敘」七篆字，末題「唐大曆元年六月既望懷素書」，與文本全不合。而案其所刻千字文後亦題此十二字，未知何據？

《永州府志》卷十八上，〈金石略〉：

嘗見三原刻本，雄勁中有古意，觀此刻有聖凡之別。其題識大都後人所增，或傳是南渭故藩所刻，而不實志模刻年月，使庵僧冒唐刻之名，殊不可解也。

案綠天庵有懷素千文石刻，似是西安石刻之臨本也。後有年月日名，首尾共一百三十六行。不獨行款俱不符，并脫去「黍稷」之「黍」，而誤出於後「誅斬盜賊」之「誅」字下。考「停雲館帖」絹本千文後題「貞元十五年」，西安石刻後無年月，此題云「唐大曆元年六月既望懷素書」，與「自敘帖」尾一字不異，未知此十二字從何得之。石首亦題「綠天庵瑞石帖」六篆字，後有「藏真」二字陽文長印，又「長沙懷素書印」六字大陽文方印。卷首又摹宋元明諸名家鑒藏大小長方印十五、六印，蓋骨董家作偽所為，未可信為善本也。

《永州府志》：

案此刻賞鑑諸印，惟袁忠徹、溫如玉、錢塘石某可辨，大都明初人為多，其刻時當在中明之世。篇內「凌摩」之「摩」，幾不可識。此外馳縱亦多異元本。模手、刻工皆遠不逮陝也。

(四) 杜詩秋興八首

《湖南通志》：  
案懷素書秋興八首，石刻在綠天庵。今本社工部集泛泛作汎汎，裘馬作衣馬，奕某之某作碁，碁乃碁之俗字，作碁為正。弈字當從亦從升，與奕世之奕有別，此帖下從大，非是。洲前之洲，當有水旁，而此作州；帝王州之州，不當有水旁，而此反作洲，皆非是。此帖亦近人臨摹，不知藍本所出。前題「唐懷素書」四字，下有陽文長圓印，刻「墨池飛出北溟魚」七字，後亦有陽文「藏真」二字長方印。又後題「後裔孫通浩」五正書，皆近人手筆也。帖尾有「壬辰三月」云云，而無紀年。案懷素絹本千文書於貞元十五年，自署年六十有三。又「東書堂帖」載其貞元十二年一帖，自注時六十，所紀年歲與千文合。則懷素生於開元二十五年丁丑，至天寶十一載壬辰，年止十六；其後壬辰則為憲宗元和之七年，懷素年已七十有六矣。

《永州府志》：

此書曾見祝允明墨跡，與此絕肖，並不著其何人書，蓋為明時書

家所尚可知也。

(五) 論書帖

《湖南通志》：

案此刻草書七行，刻在「淳化閣帖」第五卷，末題「僧素書」。考「宣和書譜」載御府所藏懷素草書一百有二，內有「論書帖」，疑即此。又米芾謂是帖與章帝草書千文同是偽作。案其筆法與懷素諸帖不類，綠天庵有此石刻，乃近人從閣帖轉模，更無可取。末有陽文圖章二方，一云「本庵」，一云「山人」，未知即重刻之庵僧之名號否。

《永州府志》：

案各帖後刻庵僧楞寂輝所繪墨梅蘭竹，同嵌於壁，其上亦有「山人」章，詢此僧乃□□間人，此帖必楞手所續模也。

二、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

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，《湖南通志》云：「似是近代人重模本。」《永州府志》則云：「嘗見三原刻本，雄勁中有古意，觀此刻有聖凡之別。」

又謂：「或傳是南渭故藩所刻，而不實志模刻年月，使庵僧冒唐刻之名，殊不可解也。」案此刻「唐大曆元年六月既望懷素書」，與故宮墨蹟本或其他刻本的「大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」大異，是故「而不實志模刻年月」，而換上另一題款，又附上粗俗至極的「藏真」與「長沙懷素書印」二印，以「使庵僧冒唐刻之名」，偽造之說已呼之欲出，而此刻本臨寫不實，多行己意，所以與陝西刻本相較，遂有「聖凡之別」。

論者前言：「年款之所以如此，應是收藏者為保留真本，以摹寫本繳入內府或讓渡他人，為避人耳目，於是在真本上動了手脚，割裂原來的『大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』，換過重新補書而且年代矛盾的年款，綠天庵刻本遂照樣摹刻。」後又改稱：「因此無論此兩帖為『摹本』或『臨本』，均與此十二字無關；題末之懷素『藏真』與『長沙懷素書印』押印，自亦存而不論。」怪哉！之前為其想像一套說詞，之後又說要「存而不論」，豈有如此邏輯方式？又豈可「存而不論」？此一「唐大曆元年六月既望懷素書」題款，與「藏真」、「長沙懷素

書印」二印，明顯是偽造出來的產物，更是此帖偽刻的旁證之一，豈有不順己意，便一廂情願「存而不論」？學者有誰會信服此一論證方法？

對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的評價之低，不止《永州府志》所云的「觀此刻有聖凡之別」，徐樹鈞《寶鴨齋題跋》的「明刻懷素自敘帖」條下則云：（註三）

懷素自敘帖傳世有三本，空青老人論之詳矣，此明嘉靖文氏壽承刻石，神采飛動，蟬翼初揭，與世傳聖母帖、藏真帖、苦筍帖，同一超妙。……真蹟明時歷數相臣家，有力者以八百金買去，本朝乾隆間入內府，同治間潘伯寅大司寇在懋勤殿猶及見之。此所謂下真蹟一等，視永州綠天庵刻本，不啻倍蓰爾。光緒十六年庚寅上元日。

「視永州綠天庵刻本，不啻倍蓰爾。」倍爲一倍，蓰爲五倍，倍蓰則爲相差很多之意。被清朝時人認爲「有聖凡之別」、「不啻倍蓰爾」的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，卻於兩百餘年後，被台灣書家視若珍寶、孤芳自

賞，豈不有趣？

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，帖末另刻有「義烏馮拭襃」與「羅相楊瑄」兩行題款，其下並各刻有兩方印，最後一行則爲「□寧李零鐫」。（圖一）經查《義烏縣志》，在卷十二的〈仕林〉，確實發現「馮拭襃」此人，下註兩行小字云：「字華友，乾隆間永州通判。署邵武府知府。」（註四）再查《永州府志》的「職官表」，亦有馮拭襃擔任通判的紀錄，下云：「大興監



圖一

生，（乾隆）五年任。」（註五）另在同書的「教諭」條中，看到「楊瑄」之名，下云：「湘陰舉人，（乾隆）四年任。十年乙丑，入翰林。」（註六）

至此真相大白，綠天庵諸帖遲至乾隆年間才刻石，是故《湖南通志》云：「似是近代人重模本」、「蓋亦近人取西安元祐石刻本重模者」、「此帖亦近人臨摹」、「乃近人從閣帖轉模」，所謂「近代人」、「近人」，據刻石當時還不足百年！這也解釋出爲何筆者查閱明朝各種版本的《永州府志》，從洪武刊本到弘治刊本、隆慶刊本，都沒看到綠天庵刻帖的任何著錄。（註七）這也證明爲什麼張彥生的《善本碑帖錄》，會云：「清初刻綠天庵帖四種。」（註八）而如果此刻真爲煌煌巨蹟，豈會只有當地小小兩名通判和教諭題款而已？僞款僞印，加上兩位名不見經傳的地方知識分子的題款，這說明了什麼，不言而喻，不過是「使庵僧冒唐刻之名」的假造品而已。

宋拓「群玉堂帖」第四卷「懷素大草千文」，其後的吳榮光道光十七年（一八三七）的跋文：（註九）

書，不知凡幾。無論近世所傳聖母、自敘絹本、大草千文墨蹟，爲後人臨本。即湘中綠天庵專帖，皆屬贗跡。

既云「皆」屬贗跡，可知主詞爲複數，又「即湘中綠天庵專帖」爲重新起句，「近世所傳聖母、自敘絹本、大草千文墨蹟」乃是「後人臨本」，「湘中綠天庵專帖」則「皆屬贗跡」，明顯可知吳榮光所指的是綠天庵所刻的諸帖是「贗跡」。

論者不察，竟又指稱「如果把綠天庵本（自敘帖）也指爲『皆屬贗跡』，則吳氏當時未仔細看過《湖南通志》嘉慶舊志的記載。」此說大錯特錯，因爲吳榮光是最有資格看到刊於嘉慶二十五年（一八一〇）《湖南通志》的人，吳榮光於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）擔任湖南巡撫，（註十）後又兼署湖廣總督。豈有誤讀古人文字在前，後又古人不順己意，則想當然爾的厚誣古人沒仔細看過如何如何的典籍。此種論調，實在令人難以苟同。（註十一）

或謂「明代項穆在其《書法雅言·中和》文中，曾有如下的判斷：『世傳（自敘帖）殊過枯澀，不足法

也。」指的正是如故宮收藏的墨跡本，項穆想必未曾見過綠天庵刻本（自敘帖）。「怪哉！處於明朝中葉以後的項元汴之子項穆，豈有可能穿越時空，看到刻於清朝乾隆年間的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？又是一個古人不順己意，則厚誣古人的典型例子。」

又吳榮光除了是個著名的收藏大家外，還是個碑帖與金石專家，在他名下，便刻了「筠清館法帖」六卷和「嶽麓書院法帖」一卷，（註十二）後者石存湖南長湖南長沙嶽麓書院，可見他和湖南的關係，而在其《石雲山人詩集》，更有數十首關於其遊歷湖南



圖二

的詩作。（註十三）金石方面的著作有《筠清館金石錄》，另將他的收藏撰成《辛丑消夏記》一書。「精鑑別，藏金石拓本三千餘種，詩古文詞書畫皆工。」（註十四）張伯英謂其「荷屋書學，自非諸家所可望也。」（「荷屋」為吳榮光之號）。（註十五）「如果把綠天庵本（自敘帖）也指為『皆屬贗跡』，則「吳氏當時未仔細看過《湖南通志》嘉慶舊志的記載」，吳榮光何辜？

### 三、綠天庵刻本「千字文」

《湖南通志》稱綠天庵刻本「懷素千文」，「似是西安石刻之臨本也」，並指出其乖謬之處，又指出帖末題款「唐大曆元年六月既望懷素書」和「藏真」、「長沙懷素書印」，與「自帖」尾完全相同，卷首鑿藏印「蓋骨董家作偽所為」，「未可信為善本也」。《永州府志》則稱此刻「亦多異原本，摩手、刻工皆遠不逮陝也。」

案綠天庵刻本「懷素千文」，後有劉獻靖與饒襲弘二跋，劉跋難以辨識，饒襲弘跋云：（圖二）

於綠天庵得瑞石，後同寅劉子

觀山作詩紀勝，遠近士大夫唱和成帙，登□梨棗。聖世景運昌隆，湘南人文薈萃，精彩煥發，非偶然也。因思綠天以懷公傳，懷公以草書傳，而懷公草書久不傳於綠天，杞宋無徵，非所以黼黻太平也，□得聖母真帖而已。龍蛇出蟄，復得千文善本，更為珠玉滿盤，臨摹錄石綠天再補矣。若夫踵事增嫩，鼓吹休明於□古君子有厚望焉。都梁饒襲弘跋。

帖末則有「僧通藏 通浩」與「浮塢李寧鐫」兩行小字，可見「懷素千文」與「自敘帖」都是由李寧所鐫刻。筆者於《零陵縣志》上搜尋出「饒襲宏」其人，他於康熙五十五年擔任「訓導」一職，（註十六）再次證明綠天庵刻帖乃成於清初。綠天庵刻石，其後不是通判、教諭，便是訓導之類的地方知識分子所題識或題跋，誇稱「龍蛇出蟄」、「珠玉滿盤」，其水準與程度可知。（註十七）

### 四、綠天庵刻本「聖母帖」

《湖南通志》稱綠天庵刻本「聖母帖」：「蓋亦近人取西安元祐石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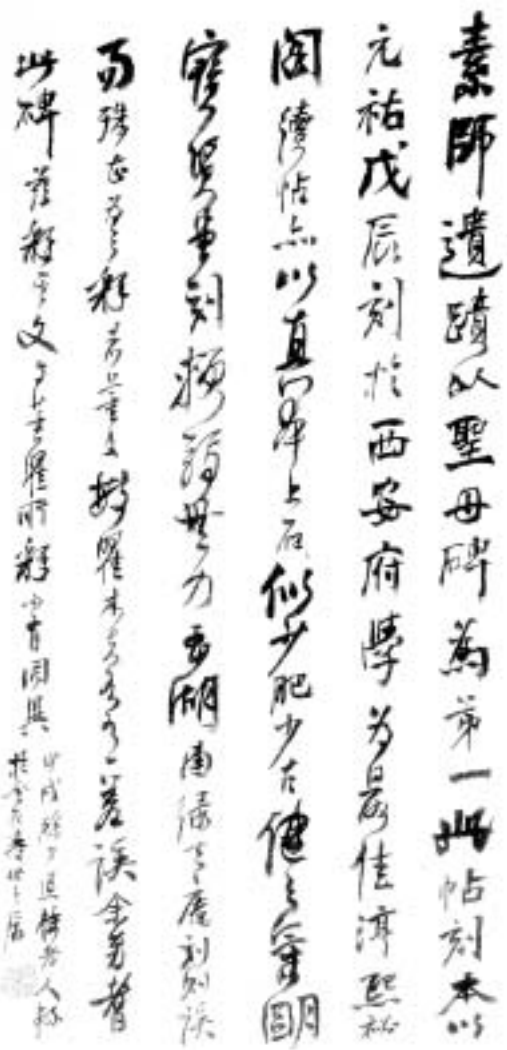
重模者」，並指出其內文「不獨行款、字數更易……錯謬殊甚。」與「千字文」一樣，都是錯誤百出、臨摹不實的偽刻。《永州府志》則稱此刻：「『綠天瑞石』蓋即相傳石成蕉紋之說，當時或即採本山之石所成，故以名帖，藉示誇詡耳。」從此處可得知「綠天庵瑞石帖」的名稱來源，即因相傳石頭有蕉葉之紋，故採石刻書，「藉示誇詡耳」！

今見一舊拓「聖母帖」，後有清末著名金石收藏家吳雲跋文曰：（註十

八）（圖二）素師遺蹟以聖母碑為第一，此帖刻本以元祐戊辰刻於西安府學為最佳，淳熙祕閣續帖亦以真本上石，似少肥少古健之氣。明寶賢堂刻軟弱無力，至湖南綠天庵刻，則誤易殊甚。

清初綠天庵所刻諸帖，當代評價便已如此之低，何以「自敘」能獨高於現代？

#### 五、綠天庵刻本「杜詩秋興八首」



圖三

《湖南通志》云此帖：「此帖亦近人臨摹，不知藍本所出。」也同樣指出其書內容的謬誤多處。而後亦有「藏真」字長方偽印，此印亦見於「自敘帖」與「千字文」帖後，帖前則刻了「墨池飛出北溟魚」長圓印。（註十九）綠天庵本中最高無稽的便是此帖，因為在此之前，從未有懷素此帖的任何蹤跡與著錄，此帖則是偽中之偽，託名於懷素之下，完全與懷素無關。

若照論者所稱：「年款之所以如此，應是收藏者為保留真本，以摹寫本繳入內府或讓渡他人，為避人耳目，於是在真本上動了手脚，割裂原來的『大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』，換過重新補書而且年代矛盾的年款，綠天庵刻本遂照樣摹刻。」吾人不禁要問：是哪位收藏者同時保有「自敘帖」與「千字文」兩真本？是哪位收藏者如此富有心機，為避人耳目，割裂原有題款，同時將兩真本換上「唐大曆元年六月既望懷素書」的假款？豈有如此為作偽者設想一套完美周到的說辭？作偽者如有知，當竊笑於地下矣。

帖尾款署「唐壬辰三月二日懷素

書」，案懷素生卒之年有二說，一為生於開元十三年（七二五），卒於貞元元年（七八五）；一為開元二十五年（七三七），卒於貞元十五年（七九九）。今人多採後說，認為前說不足據。（註二十）是故《湖南通志》謂「壬辰」一為天寶十一載壬辰（七五二），其後則是憲宗元和七年（八一二）。若為前者，懷素才十六歲，若是後者，懷素則已卒，所以此一「唐壬辰三月二日懷素書」，又是個偽款，與「自敘帖」、「千字文」同出一轍，其作偽手段低劣，再附上偽刻的懷素印，更是不倫不類的低俗產品。

《永州府志》云：「此書曾見祝允明墨跡，與此絕肖，並不著其何人書，蓋為明時書家所尚可知也。」案此書作者確有見識，除了指出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與陝刻本有「聖凡之別」外，亦看出綠天庵刻本「杜詩秋興八首」與祝允明所書的同樣作品「絕肖」。杜甫「秋興八首」此詩是祝氏最喜歡寫的古詩之一，故今傳有數本，目前可見的至少有兩本，一在美國收藏家之手，一在北京故宮博物院，前者只殘存二首，其餘六首由文徵明所補；（註二一）後者劉九庵認

為乃是祝氏外孫吳應卯所偽造。（註二二）

若將綠天庵本和祝允明殘本兩者相對照（北京故宮疑本暫不論），確實可以發現綠天庵本極可能是出於臨書祝允明墨蹟，此一線索，或可供研究祝允明書法者參考與研究。（圖四與圖五）

#### 六、綠天庵刻本「論書帖」

《湖南通志》謂此帖：「案其筆法與懷素諸帖不類，綠天庵有此石刻，乃近人從閣帖轉模，更無可取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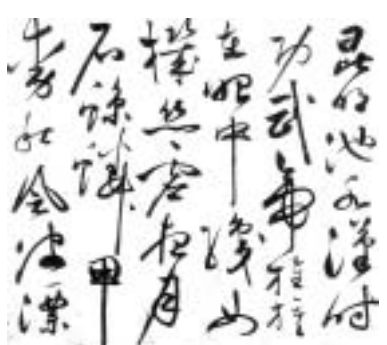
從二至六節分論綠天庵的五種懷素刻帖，明顯可知這是一套無足可觀的偽刻，不但內文謬誤甚多，多是根

據前人刻帖而放筆臨寫，故與原來刻帖相差甚多。帖末則偽造題款與印鑑，還將不是懷素書蹟的作品託名於懷素之下，而據筆者考證，此帖刻石年代晚至清初，不但時人對其評價甚低，後人亦無一人稱讚該帖者。而如今竟有論者將各種證據視而不見，還要吾人對偽款偽印「存而不論」，豈有如此昧於事實的論辯方式？五帖之相關性極大，同出於湖南零陵「綠天庵」，豈有其他諸帖皆偽，而「自敘帖」獨為「天外飛來的一筆」，獨為可信的「摹本傳刻」？此一獨特識見，真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學者先將「大字陰符經」誤以為美，後又將懷素墨蹟本「自敘帖」誤以為美，一再「前見未密，後見轉精」，可見個人自由心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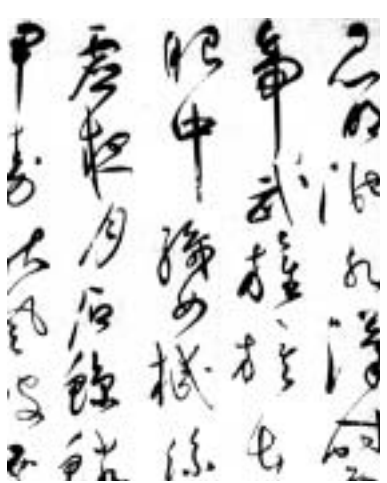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



綠天庵本「杜詩秋興八首」



祝允明書



祝允明書（疑本）

圖五



綠天庵本「杜詩秋興八首」



祝允明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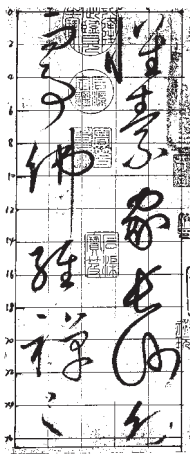
的藝術賞析，應用於藝術史研究與辯證是多麼地不可靠，如今再誤，亦是不足為奇。

#### 七、綠天庵刻「自敘帖」為臨本之證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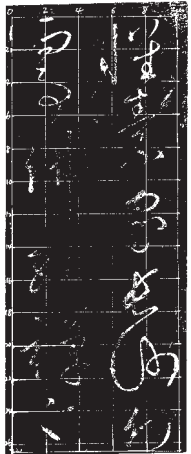
筆者為探索綠天庵刻本的「自敘帖」之真偽，曾求教於書法家張光賓先生，張先生並出示他根據故宮墨蹟本所臨寫的「自敘帖」數張長紙，完全一氣呵成，並云他早已把整個「自

敘」都「默帖」在腦中，可見書法家平日臨摹的所下的功夫。針對綠天庵本的「自敘帖」與故宮墨蹟本，有數行並不符合的歧異之處，張先生猜測可能是刻碑時所造成的移行現象，他並舉例「三希堂法帖」亦有此種現象，所以若與真蹟對照會有所出入。他並提醒我最好丈量綠天庵石刻的尺寸，看看是否因為了求刻帖尺寸的一致，而迫使碑刻移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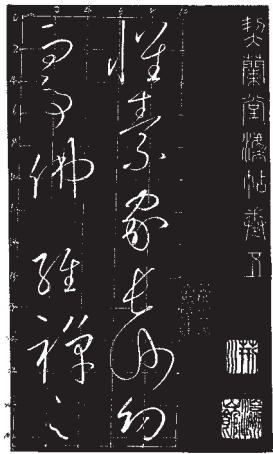
經此啓發，我至中研院傅斯年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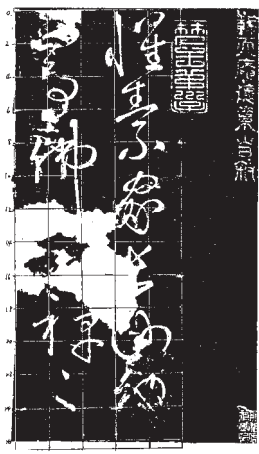
故宮墨蹟本



水鏡堂本



契蘭堂本



圖六 綠天庵本

書館，調閱該館所藏的「自敘」拓片，才意外發現綠天庵所刻的「自敘帖」是個小一號的臨本，不論與故宮墨蹟本、水鏡堂本、契蘭堂帖相比，第一行與第二行都短了約兩公分之多（從每一行的最高點到最低點的距離），（圖六）（註二二）其餘每行大都短了一至三公分之內（少數相差零點五公分左右），如第一百〇九行則相差三公分。（註二四）不獨第一與第二行，另比較各種版本的其他行數，都可以看出蘇本「自敘帖」的原蹟約略大小，證明了綠天庵本是個不實的縮小版本。

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綠天庵「自敘帖」與故宮墨蹟本或水鏡堂本有極大關聯，而綠天庵所刻五帖，除了「杜詩秋興八首」是偽託懷素名下，其餘四種，都是臨寫不實的翻刻本，故錯誤頻出，臨寫者多行己意，字字類似而稍有變化，若靠類似影印技術的「摹」，還會出現如此大的誤差，那已經不叫「摹」，而是「創作」了。可見根本不是出於「摹」，而是出自「臨」。

關於「臨」、「摹」之別，許多書畫鑑定相關書籍皆有明確解釋，此處

茲借引楊仁愷《中國書畫鑑定學稿》之說法：（註二五）

所謂臨者，乃參考原作的筆法、構圖、款式諸項追求其筆墨韻致。即「觀其形式而學之」（宋黃伯思《東觀餘論》）。這是書法和繪畫複製技術中最普遍的一種。臨習者面臨原作，徒手臨寫原作的形體。它可以使臨者的眼、手得到鍛煉。也可以較為主動地把握母本原作的筆墨技術，臨本的筆墨、行氣、氣韻更容易生動自然，但位置會較原作有明顯的出入，還會使臨者的個人特點滲入臨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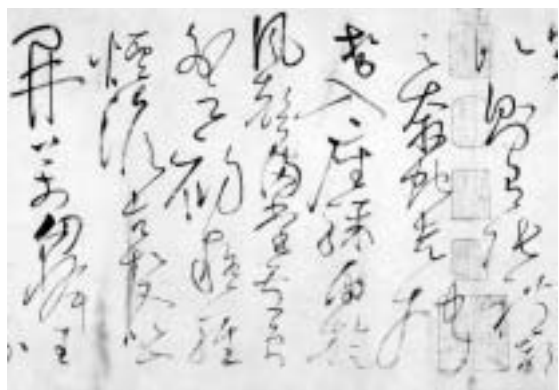
徐邦達《古書畫鑑定概論》云：（註二六）

摹是最易得其形似的。摹書有三種方法：先摹後填；不勾逕自影寫；勾摹兼臨寫，又修飾之。

簡而言之，置碑帖於一旁，仿照其筆畫寫稱「臨」；以薄紙蒙於碑帖上，依其形跡而複寫的稱「摹」。（註二七）「臨本的筆墨、行氣、氣韻更容易生動自然，但位置會較原作有明顯的出入，還會使臨者的個人特點滲入臨本。」摹本的大小、形態與位

置與原蹟幾乎完全一致。驗之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，全帖縮小了一號，吾人只聽聞過「縮臨」、「小中見大」，還沒有見過古代「縮摹」的產物。全帖根本只是臨自水鏡堂本的刻帖，所以形體雖類似，但大小、位置都不符，何來「摹本」之說？所謂「摹本傳刻」，到底摹的是哪一本？到底傳的又是哪一刻？筆者個人認為全是想像之詞。

丈量全本綠天庵刻本「自敘帖」，發現其書寫範圍大部分在二十三餘至二十四餘公分，少數逼近二十五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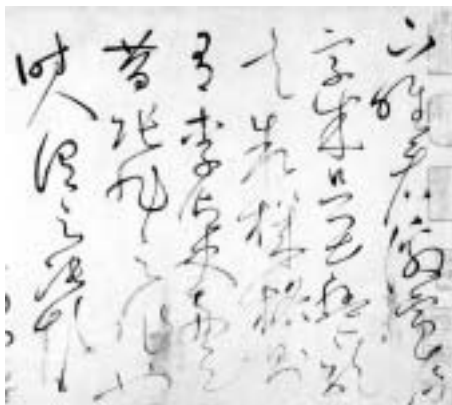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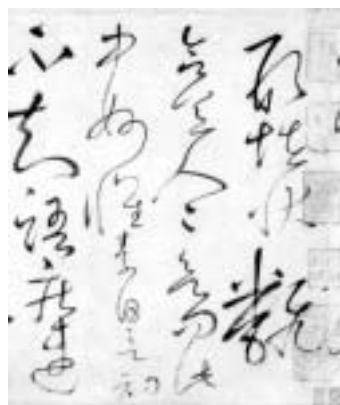
分。故宮墨蹟本則幾乎行行超過二十五公分，有數十行則在二十七公分上下，數行超過二十七公分。筆者判斷，可能是臨寫時的紙張高度不夠，所以臨寫時壓縮了字體大小，而遇到原帖較長的段落時，臨寫者不得已竟然將字移行，所以造成了與故宮墨蹟本或水鏡堂本有五處不相符的段落。而臨寫者將一個字不得已移行後，再盡量在數行內恢復到與原帖一致的型態，絕非論者所謂的行氣、布白高妙。此可證明此本臨寫的不夠確實，難怪評價不高。

第一個不符的段落為六十四至七十行，（圖七）墨蹟本第六十四行「似則有張禮部」，綠天庵本則為「似則有張禮」，究其原因，綠本五個字就寫了二十三點四公分，墨蹟本五個字則只有二十二點四公分，此處綠本寫長了，加以紙張高度不夠，而寫不下「部」字，只好被迫移行，一直到第七十行才勉強恢復原貌。

第二個不符的段落為七十五至八十行，（圖八）墨蹟本七十五行「下唯看激電流」寫到了二十七點六公分之長，綠天庵本寫不下這種長度，所以將最後一字「流」移行，到了八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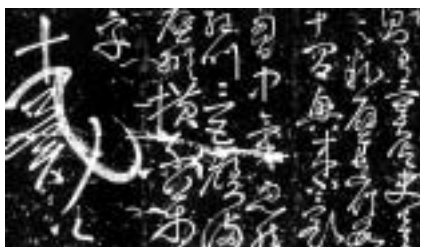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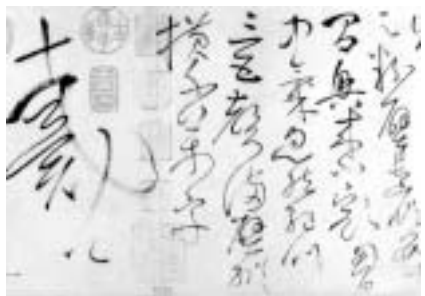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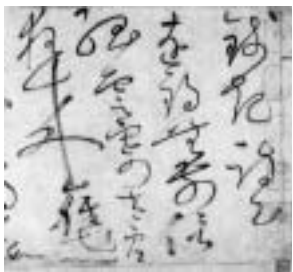
圖九

行恢復原貌。

第三個不符的段落為九十五至九十八行，（圖九）墨蹟本九十五行「形怪狀翻」，綠天庵本多寫了一個「合」字，原因就在綠本臨者「形怪狀



圖一〇



圖一一

翻」少了原帖約三公分，而「翻」字下本來就有留白處，加上這三公分，空白過多，故臨者多寫一字彌補，直到九十八行才恢復原貌。

第四個不符的段落為一〇〇至一〇五行，（圖一〇）墨蹟本一〇〇行「云粉壁長廊數十」，綠天庵本少了一

個「十」字，原因有二，一為此行綠本起筆太低（可與左右行相較），二為原帖此句太長，所以綠本寫到了「云粉壁長廊數」便寫不下去，迫使移行，直到一〇五行才將「字」寫在大大的「戴」字右上角，結果竟有論者將此視為「意在筆先，字居心後」的「神來之筆」，實是小說家之言。

第五個不符的段落為一二一至一二五行，（圖一一）墨蹟本一二二行「錢起詩云」四字，綠天庵本多寫了一個「遠」字，原因就在綠本「錢起詩云」比原帖壓縮了四點四公分之多，造成空白太多，只好再補進一個字。

#### 八、結論

湖南永州零陵綠天庵所刻的五種懷素帖，都只是當地人士於清朝乾隆年間，利用一般所見的懷素帖本臨寫上石，所以與原帖差異甚多，臨寫者加入了個人的書寫風格，甚至將不是懷素的書蹟列於其大名之下，最後再加上偽款與偽印，欲故意創造另一種版本的懷素帖，以矇騙世人，這不叫偽刻，那應該叫什麼？其書者亦應只是當地名不見經傳的小書家而已，不

但當時修地方志的知識分子對其疑問重重，後來的書法碑帖學者對其評價都不高。而故宮墨蹟本雖是勾摹本，但至少摹得翔實逼真，絕非綠天庵本所能相比，若是種種證據擺在眼前，還任憑個人自由心證侈言綠本行氣之高、布白之妙，吾人夫復何言？古人尚謂「名教中自有樂趣」，吾人只好以「偽刻中自有樂趣」來自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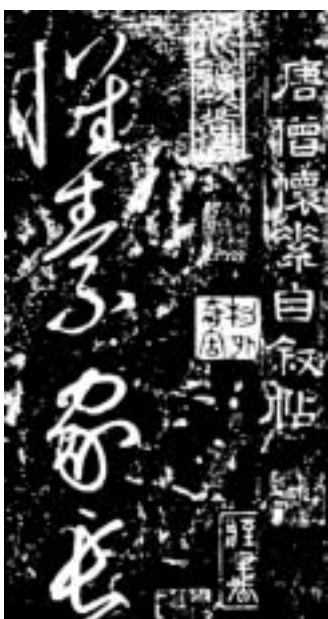
### 註釋

- 一、(清)馬慧裕修、王煦纂，《湖南通志》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線裝藏本，卷一〇五。
- 二、(清)隆慶修、宗績辰纂，《永州府志》(台北市：成文出版社，一九七六)，卷十八上。
- 三、徐樹鈞，《寶鴨齋題跋》卷下，頁十八下。收錄於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一輯，第十九冊(台北市：新文豐出版社，一九七九)。
- 四、(清)諸自毅修、程瑜纂，《義烏縣志》(台北市：成文出版社，一九七〇)，嘉慶七年刊本，卷十一，頁五。
- 五、同註一，卷十一上，頁四十一下。
- 六、同註一，卷十一中，頁十一上。
- 七、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，(明)胡璉纂、虞自明修，《洪武永州府志》縮影膠片，存十一卷。姚昂重修、林華校

- 正，《弘治永州府志》，收於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》(上海市：上海書店，一九九〇)，第六十四冊。(明)蕭良幹、張原忞纂修，《隆慶永州府志》，收於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(台灣縣：莊嚴文化，一九九六)，史部地理類第二〇一冊。
- 八、張彥生，《善本碑帖錄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八四)，頁二二一。
- 九、圖版見《中國法帖全集》(武漢市：湖北美術出版社，二〇〇二)，第七冊，頁二六至三七；與《安思遠藏善本碑帖選》(北京市：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六)。
- 十、《清史稿·宣宗本紀》卷十八，頁六五三。
- 十一、關於吳榮光之研究，可參見朱萬章，《筠清館摹刻六朝法書考——兼談吳榮光與「蘭亭序」》，《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(北京市：文物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)，頁九三至一〇二。
- 十二、容庚，《叢帖目》(台北市：華正書局，一九八四)，第一冊，頁六七七至六八四。
- 十三、(清)吳榮光，《石雲山人詩集》，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五)，集部第一四九七至二四九八冊。
- 十四、同註十一，頁八八一。
- 十五、同註十一，頁八八一。
- 十六、(清)嵇有慶修、劉沛纂，《零陵縣志》

- (台北市：成文出版社，一九七五)，卷六，頁五下至頁六上。
- 十七、關於綠天庵刻本「干文」之討論，參見王裕民，《綠天庵本「自敘帖」偽刻考辨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三五期，頁八六至九五。
- 十八、圖版見《懷素草書三帖》(上海市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二〇〇一)，頁二十六。
- 十九、圖版見於《懷素書法全集》(北京市：群言出版社，一九九四)，頁七九至一〇六。
- 二十、朱關田，《懷素「自敘」考》，《書法研究》，一九八六年四期，後收錄於氏著《唐代書法考評》(杭州市：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，一九九二)，頁一一一至二二七。王元軍，《懷素評傳》(西安市：三秦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)，頁十一。
- 二二、此書蹟圖版與釋文見於中田勇次郎、傅申編集，《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》

- (東京都：中央公論社，一九八二)，第四卷，頁九四至一〇一、一六八至一六九。另又見傅申，《海外書跡研究》(北京市：紫禁城出版社，一九八七)，頁九七與圖一九一。
- 二二、劉九庵，《祝允明草書自詩與偽書辨析》，收於《中國書法全集》(北京市：榮寶齋，一九九三)，第四十九冊，頁十一至十五；圖版與釋文見該書頁三一九至三二四與頁三五九。另從啓功之《題祝枝山草書杜詩「秋興」八首卷後》一文，可知至少還有第二本，見《啓功叢稿》(台北市：華正書局，一九九一)，頁二八一。
- 二三、故宮墨蹟本以號稱「原大原色複製」的二玄社複製卷軸測量，另二玄社出版的《原色法帖選》第二十五冊、《中國法書選》第四十三冊與翰墨軒出版的《中國名家法書全集》第十四冊，則與卷軸有零點一至零點二公分的差距。綠天庵刻本則以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



水鏡堂本「自敘帖」



舊拓「晉唐小楷」



故宮墨蹟本「自敘帖」

圖一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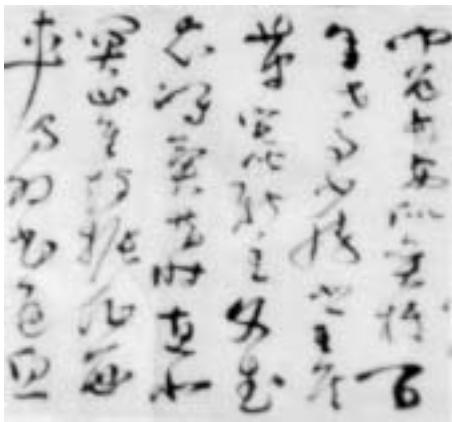
拓片實際測量，蕙風堂出版的拓本，有的與拓片相符，但大部分有零點一公分以上的誤差，如印刷品第八行，則較拓片短了零點五公分。

契蘭堂本見於《懷素／自敘帖》，《中國名家法書全集》第十四冊（香港：翰墨軒出版公司，一九九八），後有數頁縮小圖版。筆者利用帖前的謝希曾「吳郡謝希曾孝基氏審定」與唐順之的「荆川」二印，將其放大至與原印大小，原印可見於《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》與《中國藏書家印鑑》等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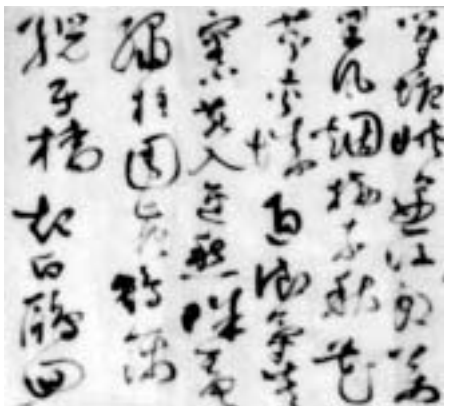
水鏡堂本首兩行見於大陸書店出版的台灣譯本《書道全集》第九卷，頁一十八。根據該書「插圖目錄」之說明，筆者將其放大至一十八點三之高度，和故宮墨蹟本基本上大小一致，發現字字大小相同，位置也相同，可見墨蹟本與水鏡堂本之間絕對是摹本的關係。至於到底是墨蹟本由水鏡堂摹寫而出，或是水鏡堂本由墨蹟本刻石入帖，這可另撰一文來探討。水鏡堂本「自敘帖」全本，另可見於《懷素草書匯編》（北京市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二），與墨蹟本相對照，可發現兩本的押縫鈐印位置竟不完全相同，但將其放大，其字形與大小幾乎與墨蹟本一致。

按照啓功說法，在文徵明以前，故宮墨蹟摹本已出現，而被人配上蘇本真跋。換句話說，水鏡堂本晚出於故宮墨蹟本，意即水鏡堂本可能便是由故宮墨蹟本刻石。（見〈論懷素「自敘帖」墨跡

本與宋刻本〉一文。）但照肖燕翼的說法，則認為墨蹟本乃是文徵明所摹，是當時文氏「遂用古法雙鉤入石」留下的底本，亦即水鏡堂本也是根據故宮墨蹟本勾摹的產物。（見〈關於懷素「自敘帖」的我見〉一文。）無論如何，不管誰摹自誰，將兩者重疊，置於光線之上，可以發現兩者勾摹的逼真程度。案筆者於《懷素自敘帖新研》一文提出「宋搨定武蘭亭」上的「許國後裔」可供比對，又於《綠天庵本「自敘帖」偽刻考辨》一文中，提及舊拓「晉唐小楷」上多枚南宋趙鼎的「趙氏藏書」方印，與故宮墨蹟本「自敘帖」上的該印有所出入，現在筆者發現「晉唐小楷」上的「趙氏藏書」印與水鏡堂刻本「自敘帖」上所摹刻的「趙氏藏書」大致相符，這兩項證據或可作為水鏡堂刻本與故宮墨



圖一三



蹟本先後關係的關鍵。即水鏡堂本「自敘帖」是從真蹟所摹刻，所以「趙氏藏書」此一收藏印近於真實，而故宮墨蹟本較晚出，所以其上後來所摹刻假印的面目與原印有所差距。（圖一二）（水鏡堂本「趙氏藏書」印圖版見於藤原楚水《圖解書道史》，頁五三一。）

二四、故宮墨蹟本的「字」在一〇四行，「戴公」在一〇五行，筆者將綠天庵本的「字」與「戴公」算作同一行，列為第一〇五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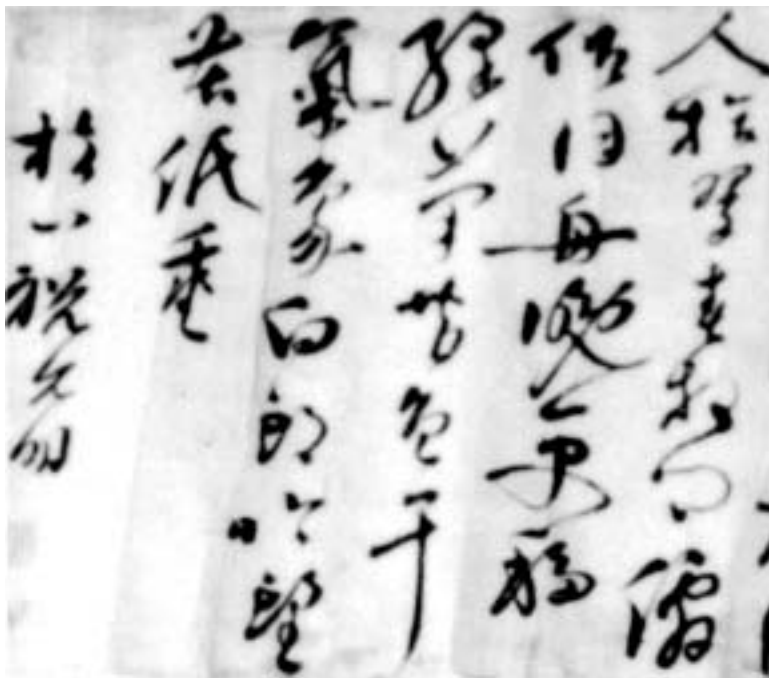
二五、楊仁愷，《中國書畫鑑定學稿》（台北市：蘭臺出版社，二〇〇二），頁一二八。

二六、徐邦達，《古書畫鑑定概論》（北京市：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一），頁六四。

二七、《中國美術辭典》（台北市：雄獅圖書公司，一九八九），頁三〇五。

### 補註：

此文完稿後，筆者無意間得知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的汪榮祖教授，收藏有祝允明書「杜詩秋興八首」長卷，經閱汪教授所提供之照片（圖一二），確定綠天庵刻懷素書「秋興八首」乃是出於臨書祝允明該卷而成，八首詩的次序完全相同，長卷後款著「枝山祝允明」（圖一四）。經比較，綠天庵所刻乃是完全任憑己意的臨書之作，與祝允明原卷大致相符但卻有所出入。而刻帖者將「枝



圖一四

山祝允明」除去，改為「唐懷素書」以欺人耳目，此等作偽伎倆，加上臨書不實、增添偽款偽印，清初綠天庵所刻諸帖之訛謬粗糙明顯可知。

